

导 言

精神因素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推动力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进步的根本因素是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是经济力量的推动。这是一种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然而这个过程并不是自动实现的，任何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必须诉诸于人类实践。只有具有自觉意识的、抱有一定的价值准则和生活目的的人的活动，才赋予历史以具体。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深层原因，除了客观物质条件以外，还有伦理、文化、民族精神等种种非经济因素作用。

近现代各国经济发展的过程鲜明地表现出精神力量对经济发展的推动意义。

一、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人的 观念开放的结果

欧洲中世纪的宗教文化曾一直被视为近代欧洲文明的桎梏。但是，在经过一些进步神学家对基督教信仰、禁欲、“善功”等重要宗教观念的重建与新释之后，却使这种古老的精神文化焕发出历史性的功力，成为刺激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伦理精神”。

在分析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时，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十分重视并高度评价了基督教改革所起到的历史作用。他认为，从路德开始到加尔文的宗教思想改革及其所导致的新伦理精神是西方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宗教改革后的新教，虽然也相信上帝

和彼岸世界，但其思维中心已从上帝转移到人自身，它充分肯定了人的智慧和能力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此后 200 年的欧洲观念更新正是以此为基础的。对此，恩格斯也曾评论说，欧洲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次大决战就是由德国兴起而后遍及西欧的宗教改革运动。

那么，16 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及其带来的观念更新如何促进了经济发展呢？韦伯具体分析了加尔文宗教改革的思想意义。他指出，在加尔文看来，任何个人无法知道自己是否是上帝的选民，也无法得知自己最终能否在彼岸世界得救，但只要是选民，他就应该用自己的劳动创造财富，百折不回地获取事业的成功，以便增加上帝的荣耀。所以，通过正当手段获取财富，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必须的，财富并不是坏事，只有为了享乐而囤积，挥霍财富才是罪恶。

对此，马克斯·韦伯提出，新教的这种伦理精神在本质上是合理的，它表明，（1）一个人创造财富是光荣的，因为“不停歇地、有条理地从事一项世俗职业是获得禁欲精神的最高手段，同时也是再生和信仰最纯真的最可靠、最明显的证据。”（2）一个人应该有敬业精神，兢兢业业从事创造财富的劳动。（3）要节俭和节制，不能贪图享受，挥霍纵欲。

尽管人们对韦伯新教伦理观社会价值的意义有不同认识，但应当看到，他所表述的伦理思想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意义是无可厚非的。离开精神因素引导和支撑，社会经济的发展或者十分缓慢，或者容易成为一种纯物质利益的冲动和荒唐挥霍。

二、东亚经济的崛起是重视精神意识的物质反映

近些年来，亚洲，尤其是东亚经济的崛起引起世界的瞩目。据统计，1989 年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为 4.9%，国际收支为 569 亿美元，台湾则为 7.2% 和 110 亿美元，南韩为 6.7% 和 54 亿美元，香

港为 3% 和 30 亿美元，新加坡为 9.2% 和 23 亿美元。其中，尤其是新加坡成为“策略经济发展”的一颗明星，在 1991 年世界最权威的经济制定、预测机构——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的全球各国竞争力排行榜上高居新兴国家之首，其年增长率近 20 年来一直在 9% 以上，90 年代初已人均生产总值达 10450 美元，为美国的 1/2。据说，新加坡已确定在 2030 年人均国民收入要达到那时美国的水平。在分析东亚经济发展的深层原因时，不少学者都看到了精神因素的作用，并称之为“亚洲资本主义精神”。

美国学者彼得·伯格在深入研究亚洲经济发展的原因之后得出结论认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崛起，与它们很强的成就感以及为企业发展和为社会奉献的精神分不开。这主要表现在“有非常强的成就取向的工作伦理；高度的集体团结感存在于家庭和家外的一些群体中；对教育赋予相当高的声誉；同时对子女的教育有很强的动机。”^①

70 年代以来，随着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对其经济发展内在精神的分析日益成为国际经济界和理论界关注的问题。欧美和日本的许多学者都认为，除去其他因素以外，日本的“集团的利益优于个人利益的集团中心主义”是其经济发展的不可忽视的重要精神因素。至于这种因素产生的原因，则众说纷纭。有的认为这是该民族历史家族主义的延续，有的说是其战后强烈地意识贫困和国际危机感而形成的“命运共同体”意识^②。有的则提出是其“经营福利主义”使人忠诚于集团，并使劳资双方齐心协力、谋求提高企业业绩，发展企业与职工福利双重目的的结果。但不论怎样，日本的这种集团意识以及对人的精神的重视是存在的，并在对日本的经济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难怪美国哈佛大学的罗

① 塞缪尔·亨廷顿《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 423 页，上海译文出版社。

② 参见罗伯特：《东洋奇迹——日本经济奥秘剖析》第 567 页。

伯特·B·莱什教授在分析比较了日美企业经营和经济发展之后提出，“现在需要的并不是管理技术，而是将落后于时代的大量生产转换为柔软的结构体系，构筑日本企业中所看到的重视人才和人与人的关系的体系。”^①

面对东亚经济的迅速崛起，以中国文化为基点的现代新儒主义者。针对六七十年代，由于西方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带来的精神失落感和空虚感提出：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儒教与道教》二部影响巨大的论著，所认定的儒家伦理和道家价值系统无法导致现代化的论断，需要重新反省。现代新儒学认为：日本经济的持续发展，南韩、新加坡和中国台湾、香港工业文明的出现，是对韦伯理论的挑战。它表明中国的儒家思想同样是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现代化的精神力量。东亚属于中国文化圈，而中国文化的本质是儒家文化。东亚经济的起飞正是儒家文化所强调整体伦理意识发生作用的结果。因此儒家伦理精神力量是东亚经济发展的深层原因。学者们分析认为，儒家伦理精神对经济进步的意义在于：

第一，以整体价值观为核心的儒家文化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在当前，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特别是信息科学、信息技术等突飞猛进的发展及其应用使地球相对变小。生存利益使人类共同治理地球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反映整体至上的精神意识和价值观念对于推动世界市场经济的发展的作用日益突出，而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整体价值观的儒家传统意识则符合了这种客观要求。

第二，从儒家文化所特有的入世主义看，它对入自身、对人际关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和协调较之基督教、佛教乃至古希腊文化更易于切近生活现实，更易于在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中发生作用。因此，经过反思、改造和重构的儒家伦理精神可以而

^①参见罗伯特：《东洋奇迹——日本经济奥秘剖析》第 567 页。

且已经成为当代经济发展的劲力。美国学者弗兰克·吉伯尼更直接地提出：日本经济腾飞的原因就在于日本人巧妙地将儒家文化的入世功能与美国占领军带来的经济民主主义相融合的结果。

这些都说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虽然各自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思想特征，但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精神力量的作用。精神力量在任何时候都对经济发展起到定位和推动作用。

三、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 离不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要求它必须有以服务于社会和整体的精神文明作用，以保障其沿着正确的方向正常运转。

首先，只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才能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文社会的价值取向。我们发展市场经济的目的不是为经济而经济，而是为了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人的价值的统一。因此，它要求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必须兼顾社会环境和人的权益，克服实际经济活动中的“野蛮经济活动”。它要求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不能损害社会利益，并更好的服务于社会整体利益。它要求各社会服务部门要以保障社会公正而健康的运转，提高社会整体文化素质为宗旨。例如，政府要廉洁为民，服务于社会，教育要把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作为最高目标。任何服务部门都不得离开其人文社会价值而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它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重视科学技术的普及和利用，积极从科学技术发展中为经济发展寻求推动力。因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说到底是一场科技竞争。没有科学技术和劳动者文化素质做动力，市场经济不会真正的持久的发展。

其次，只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才能调整微观行为，使人的经济活动具有正义和公平意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人

的解放和发展，但人的任何经济行为都需要调整和约束。制度、法律是制约经济行为的硬因素，而精神道德、意识观念则是制约经济行为的软因素，后者的发展程度直接反映到经济发展的现实之中。众所周知，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着不少为人民强烈不满的现象，例如，权钱交易、炒倒投机、牟取暴利、伪劣假冒、违法经营等。造成这样现象的原因固然有法制不健全、执法不严格、改革不配套、制度有漏洞等，但从精神意识方面来讲，则是缺乏经济正义和经济伦理意识的后果。从这些问题明显看出精神文明的意义和作用。

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不单纯是经济利益的追求，更是精神文明的显示。一位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说：如果单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人可能不如动物活的幸福。因为人生存是含有精神内容和社会意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造就的是文明的主体，而不是文明时代的野蛮和愚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是具有奉献精神和服务于社会、整体的功利主义，而不仅仅是物质利益的攫取和不顾他人的私利主义者。这说明，不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精神意识的作用，任何社会的发展也都离不开精神意识的作用。正是精神文明，使人的私利微观行为符合正义和公平原则，从而与社会整体经济发展协调起来，并由此体现出人的社会意义。

再次，精神文明各个方面都在积极地影响着社会关系体系的调节与重组，指导并推动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

任何社会时期社会关系体系的稳定与合理化，都是精神文明发生作用的结果。其中，政治、法律思想物化为国家政权，政治法律制度及其设施或组织，成为保护和维系社会关系秩序化的根本力量和限制手段；哲学、道德等意识及其指导下形成的价值取向、社会心理、风俗习惯等，都在以观念性的约束形式调整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之纳入社会化要求的规范和秩序之内。这些社会意识形态与教育、科学等精神产品都在直接或间接地为社

会经济基础服务。

同时，精神文明的发展成果也是各种现存社会关系体系的批判因素和批判力量。历史唯物主义指出，当生产力发展到生产关系所无法容纳时，生产关系便变为它的桎梏，上层建筑也相继与生产力发展相冲突。整个社会关系开始由适应生产力要求变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从而失去对生产力发展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在冲破阻力、变革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更新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重组社会关系体系的过程中，精神因素往往起着主导作用。它通过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否定现存社会制度的合理性，揭示更新社会制度的可能性和必然性，阐明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从而为人们消灭旧社会，建立新社会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指导，通过宣传教育形成舆论，最终形成变革社会的革命行动。这就是人类走向更高秩序和更高文明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出现和完成，离不开精神文明的作用。反过来，社会制度的文明发展，又为精神文明的发展和发挥作用造就了更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功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初期计划经济体制的辩证否定，从而形成社会历史发展阶梯上进步与文明的性质。然而必须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性质的实现，如同以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一样，同样离不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内在因素的推动。这便是我们必须重视分析和认真研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各现实、具体因素的根本原因。

第 一 章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文明的支柱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经济体制。从本质上讲，它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统一。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现过程看，它既是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结果，又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市场经济制约和保证的结果。同历史上任何社会进步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决定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又必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精神支柱，二者是社会进步的辩证统一体。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使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发生重大变化。各种形式的经济主体空前活跃，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然而不可否认，体制转轨所造成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的混乱，市场利益机制和竞争机制所带来的社会主义凝聚力的消弱，迫切需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力量。在当前，结合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实际，特别需要重视和加强精神文明三大支柱的建设，即理想、道德和纪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以及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文明建设的原则和标准。

一、充分认识加强理想、道德和纪律教育对 市场经济建设的迫切性

邓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离不开精神文明的指导，精

神文明的内容不仅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其中，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这一思想对我国市场经济建设有着重大现实意义。从我国国情和市场经济基础实际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基础之上的。这种多种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并存的特征，要求我们必须突出理想、道德和纪律的作用。

（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离不开理想的指引。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忘记与背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将来实现共产主义的大目标。这是我们的理想，是大原则，是社会主义信念的源泉。我国市场经济模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科学地遵循经济发展的规律，用新的实践方式促进生产力发展，进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

首先，理想作为人们对奋斗目标的向往，其重要性首先在于，它是我们前进道路的航标。只有在认定理想的指引下，才能减少盲目性，增强自觉性，始终沿着既定目标前进。也只有在理想目标指引下，才能使人坚定信念，产生实现目标的信心和毅力，使我们有积极健康的价值观念和与伟大理想相一致的社会行为，从而保证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其次，理想是人们行为追求的力量源泉。它能使人产生奋斗的激情和内驱力，激发出社会个体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烈责任感，并由此形成以这一伟大目标为中心的社会群体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实践者为达到目标而艰苦奋斗，努力拼搏，克服困难，百折不挠。邓小平同志深刻地告诫我们：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

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

再次，理想这一精神支柱在从总体上保证着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现实因素的制约，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不会是一蹴而就。相反，它可能是一个长期、复杂，间或有着曲折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理想和信念将会使我们高瞻远瞩，对前途抱有希望，不会因征途的坎坷而畏难和退缩。

（二）发展市场经济急需加强并改善道德教育。

道德是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各种关系的行为规范总合。只要人们相互交往，形成社会关系，就需要一定的规范作为是非标准，去约束和衡量人们的行为。

在当前，加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用道德的力量去调整和约束人们的经济行为，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以及纠正社会生活中的某些非道德化倾向具有迫切意义。

第一，道德教育要突出协调经济主体的利益行为和社会行为的一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文明的商品经济，经济主体的道德行为是市场文明的基本涵义。我们发展市场经济一方面应当肯定由于主体能力不同而形成的竞争优劣，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们在分配上的合理差异，另一方面则要教育人们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鼓励人们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协调地结合起来，提倡经济行为中要诚实有信、互助互爱和扶贫济困的社会主义道德。反对损人利己、损公肥私、以权谋私、欺诈勒索的不道德行为。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我们固然重视效率和利益，但更要旗帜鲜明地反对金钱至上和唯利是图的剥削阶级意识，用高尚道德力量保障各种社会职业和整体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只有昭示和提出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道德约束，才能使人的经济行为具有规范性、进步性和文明性。反之，离开共产主义道德指导，我国市场经济必然走入歧途。

第二，道德教育的中心是要围绕制止市场交换原则的泛化来进行。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建设中，需要解决的一个认识问题是如何将市场经济的交换原则与社会主义道德行为协调起来，应该看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道德是一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的确立与发展，固然有多种原因，但最深刻的原因则在于为人民谋利益的崇高道德性。市场经济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有效手段，是使长期为贫穷所困扰的中国人民尽快走向富裕的有效途径，因而必然是社会主义道德的要求、企盼和选择。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与发展，人民得到的实惠越来越多，富裕程度越来越高，这又使为人民服务的道德原则进一步落到了实处，进一步得到了体现。正是从这样的一致性出发，一方面一如既往的把为人民服务做为社会主义道德的根基，一方面又要求各市场经济主体理直气壮的破除种种思想偏见和实际障碍，大胆参与并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然而，也必须看到，如果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坚持为人民服务的道德原则不能协调处理，也将在实际生活和具体问题上发生冲突和矛盾。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而发生于权力方面的腐败行为更是为人愤然和瞩目。一个时期以来，“互通有无”的交易之风泛起。权力与权力，权力与金钱，金钱与金钱，人情与原则等，形形色色的“交换”不时出现。有少数人，或凭借职权的便利，以权经商，以权谋私；或利用行业、职业的“优势”，大搞“交换”、“好处费”、“辛苦费”等，名目繁多。于是，为人民服务的道德原则受到沾污、挤压和践踏。在一些人看来，社会就象是一个进行“交换”的角逐场，人们都在展开某种所谓“互惠互利”的交换。发生于社会中，特别是发生于某些领导阶层身上以“交换”为特征的腐败现象，原因是复杂的，但同市场经济的交换原则侵入党内和社会思想政治领域有极大关系。

市场经济最基本最主要的原则是商品之间的等价交换。它集中体现了市场经济的品格和精神。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市场经济

的等价交换原则并不会“老老实实”的局限于经济领域，它具有一种向外扩张的冲力，试图尽可能的扩大商品化的范围。为什么原则、良心、人格、容貌等原本不是商品的东西会在特定情况下被当作“商品”出卖，其根源之一也就在这里。

为了防止和克服商品等价交换原则的外渗透，必须明确二者根本不同的内涵。等价交换原则指的是一定量的一般社会劳动之间的等价交换，而为人民服务的道德原则指的是为人民利益忘我奉献的精神，二者是不能同年而语、相提并论的。因此，等价交换原则只能适用于经济的市场交换领域，而不能套用到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来，更不能成为具有普通意义的道德规范。如果把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商品化，那就等于把各级党组织和各级政府变成了与民争利的商人集团，那也就等于动摇以至取消了党对经济工作及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资格。很显然在这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上，不能界限不清。

市场经济的交换原则不仅不能侵入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而且也不能侵入社会非经济领域。经济生活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社会生活的全部。在经济生活之外，人们还有着思想政治，伦理道德，文化审美等广泛、丰富的生活内容。家庭生活讲的是婚姻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原则，赡老育幼的原则；道德生活讲的是善与恶，评价的尺度是社会公认的伦理原则，倘若把等价交换原则价值规律移入这些领域，用来处理夫妻之间、家庭成员之间、朋友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关系，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我们最基本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的关系。这是一切关系中最深层、最基础、最具决定性的关系。从公有制经济所引申出来的是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平等互助、团结一致以及集体主义等原则。这些原则集中于、概括于为人民服务的道德原则之列。我们的思想政治、伦理道德领域要践行这些原则，我们的市场经济生活中也应当大力提倡这些原则。那种把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关

系做为根本的经济关系，以此引入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的做法，是商品等价交换泛化的表现，从根本上说，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市场经济的交换原则对国家政治生活的侵入以及在社会非经济领域中的泛化造成的危害是极为严重的。一方面，在“给多少钱，办多少事”或“办多少事，给多少钱”的“交换”之下，腐败之风必然盛行，为人民服务的道德原则必然受到严重冲击和削弱。另一方面，“交换”之风盛行，无疑会干扰、破坏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和运行规律，使市场信息失真，公平竞争失效，秩序规则紊乱，经济生活扭曲。在这样的状况下，生产要素的流动和组合，不是朝着合理和优化的方向，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人们曾经批评过的“官商”和权力经商大致属于此类。而这已经远远背离了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的轨道。

第三，道德教育的实践要重视具体层面的行为规范。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文明建设中，为了沟通情感，塑造文明主体，不能忽视具体行为的道德意义。其中，一个很现实的内容是加强社会礼仪教育，用对人的爱，用美好的情操去协调人们之间的感情和行为。

就礼仪的本性讲，它是一个把内心对自己、他人、工作、事业、社会、自然、民族、国家的尊敬之情通过美好、真善的仪容、仪式表达出来。这种表达行为的规范化，既是一个人道德修养的外在形式和具体表现，又是一个人各种道德行为的基础。礼仪道德的意义在于：它首先能帮助并要求人们努力修身养性，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完善自我。其次是用一种社会共同的行为规范引导人们约束自己，尊重他人，互相理解，互相合作，用文明的心态和举止处理个人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自觉地表现出良好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从而创造出和谐、温暖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环境。同时，礼仪道德更是一种社会润滑剂，它帮助人们艺术地处理各种复杂的关系，减少摩擦，避免冲突，为生活、工作和社会经济

发展促成良好条件。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改造行为主体，告诉大家怎样做一个情操高尚、行为规范的人。过去我们道德建设的一个薄弱环节是道德理想的高境界做人原则讲得多，而具体的普通生活做人原则重视不够。因此，往往达不到道德育人的效果。礼仪则从人类最基本的行为入手，教会人们在规范自身行为的同时，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因而简便易行，也容易被接受。

当前我国正处在新旧经济体制交替时期，经济活动增多，社会交往扩大，道德观念混乱，矛盾也相应增加，这使得人们的心理压力也较大。因此，人们迫切渴望建立一种与现代生活相适应的公共道德和良好秩序，迫切需要依托一种规范来指导行为，以适应新的变化。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文明的重要成分，把礼仪作为道德教育和道德要求的切入点是十分恰当的。它具体可见，贴近人心、人身和社会生活，很容易渗透到各个领域。礼仪教育的普及和深化，不仅受到人们的欢迎，而且也将会促进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共道德的普及和深化。

我们所以重视并强调社会礼仪教育，一个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就我国社会实践来看，社会礼仪行为的内涵在加深，应用领域在扩大。它为人们带来的不仅是笑容和礼貌，而是一种感情、一种精神，是爱与文明。社会对礼仪的需求，反映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并不仅满足于物质生活的改善，更需要一种高尚的品德和美好情操的精神环境。我国的礼仪文化源远流长，有着完整的体系和丰富的内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道德体系和行为规范，充实和推动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很有现实意义的工作。

第四，以孔繁森为榜样，做有道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者。

不论从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的深层面看，还是从社会实践的具体层面讲，当代道德文明的楷模当数孔繁森。其对人民对国家朴

实而高尚的行为，其极强的道德感召力和震撼力，促使我们每个人去直面自己，进行深刻的道德反思。

孔繁森同志是原山东省聊城地委的一名中层领导干部。他两次进藏工作，并以身殉职，表现出共产党人的崇高道德风尚。

孔繁森的道德情操表现为：

首先，他有中国人传统的美德。他孝敬年迈的母亲，心疼日夜操劳又体弱多病的妻子，对孩子充满父辈的亲情。在西藏工作的近 10 年时间里，每次谈到家庭，他的赞美和思念之情都溢于言表，不能尽孝、尽责、尽情的愧疚之情便油然而生。但孔繁森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没有把道德情感局限于家庭小范围内，而是自觉地将传统美德溶入共产主义道德之中，将自己对亲人的爱推及广大人民群众。他提出：每当看到藏族的老人，就会想到自己的父母；每当看到藏族的孩子，就仿佛见到了自己的儿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孔繁森实现了从传统道德向共产主义道德的升华，实现了道德境界的质的飞跃。由此，不难理解：孔繁森为什么那样地热爱藏族人民，又为什么能全身心地投入，毫不吝惜，毫无保留。

其次，他乐于自我牺牲和积极奉献。孔繁森之所以道德高尚，归根到底是因为他奉献得无私，奉献得真诚。在当前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许多人处处讲“实惠”，时时求利益，然而他们不懂得，如果仅仅是为了个人的“实惠”、自己的利益，而不求自我牺牲和积极奉献，那就永远得不到实惠和利益，更成不了道德高尚的人。在社会生活中，有的人总是怨天尤人。抱怨别人道德低下，而他们自己却吝于奉献，不愿为别人做点什么，甚至同别人进行非道德化的攀比。孔繁森不是这样，甘愿牺牲自己的利益，甘愿将利益献于他人。他总是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影响别人，努力营造共产主义道德的氛围。假如，政府机关公职人员乃至人人都象孔繁森那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何愁我们的社会风气不好转，又何愁

全社会的道德水平不提高，何愁腐败之风不能制止！

再次，孔繁森的道德行为是自觉的，而不是强迫的。这种自觉来自高尚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责任，来自强烈的道德使命。孔繁森两次援藏，他自觉；抚养藏族孤儿，他自愿；为藏族牧民送医送药，他主动；把钱和衣物送给藏族群众，他是情之所至、爱之所系；……用一人的苦，换来西藏人民的甜，值得！这是孔繁森的内心世界。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而不做坏事。孔繁森近 10 年如一日，一贯地严格要求自己，一贯地脚踏实地，一贯地无私奉献，这一切都来自他的高度自觉。相比之下，那些斤斤计较于一时得失的人，那些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人，那些见危不助、见死不救的人，显得何其渺小！

今天，我们正处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时期。新的环境和条件既可以锻炼人，也可以毁掉人；既能够捶打出一批批强者，也能够孕育出极少数败类。实践反复证明，搞市场经济绝不是不讲道德；恰恰相反，道德是社会主义精神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人的素质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全面进步的基本要素。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绝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去换取经济的发展。试想，如果我们的社会道德沦丧，人与人之间都象狼一样，即使经济搞上去了，那又有什么用呢？

以孔繁森为楷模，大家都来争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有道德的人。这是现实的期待，也是时代的呼唤。

（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强化纪律的力量。

纪律，是一定社会、一定组织中要求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纪律的严明程度是社会文明状态的表现。

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纪律的性质看，它表明：

第一，社会主义的纪律反映了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市场经济的纪律虽然也有强制性，但是这种纪律的性质已经不同于

以往社会。纪律的存在，保证着各经济主体在充分发挥能动性、创造性的同时，又必须有一个共同的行为准则，以便于社会整体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从而实现共同富裕；保证着社会生活和经济环境的有序状态，从而使劳动群众的共同利益和愿望、要求不断得到满足。这种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纪律体现在国法、党纪、政纪和军纪之中，也具体表现在每个人的生活环境之中。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纪律是以社会主义理想、道德为基础的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群众享有广泛的民主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纪律约束自己。没有自由的纪律，就会造成思想僵化，使人失去主动性和创造精神；没有纪律的自由，便形不成统一意志和步伐。所以，社会主义纪律是民主集中制原则指导下的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它虽有强制性，但最能调动和发挥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纪律建设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以及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首先，它是顺利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提高社会物质文明水平的必要条件。现代化经济的发展是在分工细微、技术复杂、组织严密、广泛协作的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进行的活动，任何部门和环节，任何市场经济的参与者都必须服从统一的指挥和严明的纪律。否则，各经济主体自发的利益追求就会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

其次，纪律力量是统一意志，统一步伐，保证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顺利贯彻执行和维护社会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重要保证。邓小平同志指出：“遵守纪律的最高标准，是真正维护和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国家的政策。”^①如果对党和国家政策搞自由主义，则一切理想、目标都难以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实践表明，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离不开安定团结的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